

# 再現或超越霸權：論霸權研究的旨趣

余家哲

## 摘要

霸權是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研究的重要一環，一九七〇年代興起的霸權穩定論、八〇的後霸權研究到九〇年代的制度霸權或柔性權力等，都是引領時代的重要國際關係理論。然而，跨國的歷史唯物論(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與上述霸權研究進行著一場較不引人注目的霸權研究對話，例如跨國歷史唯物論明確回應霸權穩定論的三個論題：一為霸權國的內涵和提供國際公共財的關係，其二是搭便車者(free-rider)會毀損霸權國權力的熵(entropy)論題，其三為霸權衰退之後的相關論題。本文將追尋一九七〇年代後的霸權研究，與跨國歷史唯物論之間的對話，理解兩大理論群是如何探討霸權和歷史的關係，與所呈現的不同研究內涵：是要控制、理解或解放所研究的對象（霸權），並探討雙方是如何再現和超越霸權對人類世界的影響。特別是當前如火如荼展開的全球化時代，我們不僅要關心全球化現象，更要關切全球化的推動者和背後的意識形態，若能在爬梳霸權研究之間的對話和理路的背景下，探討迄今的霸權研究脈絡，將更以更寬廣的視角觀察霸權和全球化的連結。

關鍵詞：霸權、霸權穩定論、跨國歷史唯物論、全球化

## 壹、前言

霸權(hegemony)是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研究的重要一環。其詞源為希臘文的 hegemonia，從領導者(hegemon)與領導(hegeisthai)演變而來，涵義為「領導、壓倒性的影響或權威，通常應用在政府或國家對鄰邦與同盟之間的關係。」較為接近原意的漢譯包括「霸權、領導權、支配權或是盟主權」等。<sup>1</sup>因此，當本文論及霸權的時候，並非意味著良善的或邪惡的意思，而是具有壓倒性的影響或權威，尤其是國家之間或階級之間的領導權與支配權。

霸權理論牽涉到霸權更迭、戰爭與和平、國際政治經濟、依賴論、國際體制(regimes)等議題，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中有關霸權的研究是汗牛充棟，例如摩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週期理論、<sup>2</sup>奧干斯基(A. F. K. Organski)的權力轉移理

---

<sup>1</sup> 該漢譯是因霸權該詞最早為描述希臘城邦時代，斯巴達(Spartan Hegemony, 404B.C.-371 B.C.)與底比斯(371B.C.-362B.C.)兩個城邦對於其他城邦的支配與領導權。不過，本文論述的跨國的歷史唯物論(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對於支配(domination)與霸權(hegemony)是有區別的，霸權是支配的一種形式，詳見後文。

<sup>2</sup> 摩德爾斯基的研究不限於霸權，但以研究霸權週期與戰爭最為出名，自十六世紀以來每百年都有霸權(世界大國)的興替，16世紀葡萄牙、17世紀荷蘭、18-19世紀英國與20世紀美國，研究方向有四個：1. 霸權國家興起時的戰爭契機、2. 戰爭結束後的國際秩序、3. 霸權國家在制度上的革新、以及4. 衰退的原因為何。參見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2 (Apr. 1978), pp. 214-35;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論、<sup>3</sup>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的霸權穩定論、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國際政治經濟與霸權、基歐漢(Robert Keohane)的後霸權論、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論、甘迺迪(Paul Kennedy)的霸權興衰史、考克斯(Robert W. Cox)的霸權與生產關係等，均是極為出色的霸權研究，可見這實為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之一。問題是，上述研究多著眼於霸權和權力的運作，以國家中心論的觀點探討國際無政府狀態下，霸權國憑藉何種權力崛起、如何運用自身權力以維繫霸權地位，並討論當權力轉移之際所衍生的戰爭與和平議題等。本文認為，多數的霸權研究是藉由歷史事實的個案呈現，合理化威西發利亞(Treaty of Westphalia, 1648)體系與霸權的再次出現，亦即理論與歷史的相互再現，因而無法清晰地理解、甚至超越理論與歷史之間的鴻溝，並疏於肯定人類的能動性。

然而，這些霸權理論各有不同的論點，如霸權週期理論、權力轉移理論與霸權穩定論就著重不同面向。因此，在許多霸權理論中如何挑選最主要的一個學派是值得商榷的問題。本文認為，霸權穩定論(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是最可以代表再現霸權的理論，該理論包含誰是霸權、霸權的內涵、霸權的發展、霸權的衰敗與後霸權等議題，是最完整的霸權研究。霸權穩定論學派與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結構現實主義提出的時間相近，普遍認為是金德爾伯格於《世界經濟大恐慌》(*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一書中首先提出，認為放任自由的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於霸權或主導地位的國家，擔任領導者與穩定器的角色，協助國際體制(regimes)的發展，並將此體制視為公共財(public good)。<sup>4</sup>基歐漢、魯傑(John Ruggie)與吉爾平等人又引入經濟學概念補充，使理論更為完整。環繞著霸權穩定論產生三個主要論題(thesis)，其一為霸權國家出現是提供國際公共財的必要條件，其二是搭便車者(free-rider)會毀損霸權國的權力，亦即熵(entropy)論題，其三為霸權衰退相關的論題。<sup>5</sup>

相對於主流理論，要找出具有超越霸權的研究旨趣之理論是較為困難的，尤其是一九八〇年代後實證批判、反思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等學派興起之後，在此情況下，本文認為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是具有代表性，特別是新葛蘭西學派，

---

<sup>3</sup> 奧干斯基的權力轉移理論描述權力層級化的系統，系統中具有統治地位的強權(dominant state)位於系統最上層，其下為強權、次強權與弱權國家，該理論探討系統的結構、動態與政策，提供衝突(和平)與戰爭研究之用。此學派學者認為他們不屬於現實主義或理想主義的一環，而是理性主義者。參見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sup>nd</sup> ed. (New York: Knopf, 1968); with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with Jacek Kugler and et al.,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sup>4</sup>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sup>5</sup> 在此要澄清霸權穩定論並非定於一尊，而是許多學者集中於霸權對於世界秩序的影響，一開始為經濟面向，其後拓展到政治、軍事與國際組織等。而霸權穩定論的三個論題也是如此的情況，是經過多次的爭論之後，才逐漸浮現的。當然，論題不只三個，在此是為了下文分析而列舉出三個最重要的論題。相關討論請參見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42-60, especially 146-53. 也請參見中譯本，古吉尼(Stefano Guzzini)著，鄭又平、黃烈修譯，《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0年)。

因其對於國家、霸權與國際體系等問題提出與主流國際理論不同的看法，<sup>6</sup>如考克斯、吉爾(Stephen Gill)、墨菲(Craig N. Murphy)、魯伯特(Mark E. Rupert)等人皆可歸類為新葛蘭西學派，<sup>7</sup>或是較令人滿意的學派名稱「跨國的歷史唯物論」(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本文將採用該名詞。<sup>8</sup>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第一、回顧與比較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與批判理論對於霸權的研究，找尋他們在文本所呈現的不同研究旨趣，是要控制、理解或是解放所研究的對象；第二、承上，回歸到各種理論的研究目的，不外乎是問題解決與批判兩種，相應的就是再現霸權與超越霸權，本文將評析兩種研究旨趣如何再現與超越霸權。

就章節安排，除前言與結論，共分成四個段落。第一段落討論研究旨趣在國際關係理論的意涵為何，以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與林克雷特的三種研究旨趣為主軸，加上考克斯以研究目的分類而得的兩種理論為輔。既然霸權穩定論為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本文的分析順序也就從善如流，第二到第四段落依照三個論題：霸權論題、熵論題以及後霸權論題，分析支撐理論的基本概念與邏輯推演，以理解更深層卻是研究出發點的研究旨趣；其次，以對於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實證之批判研究作為分析對象，討論此類研究背後的研究旨趣；最後，則以跨國歷史唯物論相應於三個論題的研究為分析主軸，逐一地論證研究旨趣再國際關係理論的意涵，以及如何再現與超越霸權。

## 貳、研究旨趣在國際關係理論之意涵

各種研究，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都有其核心的研究旨趣，作為其研究的出發點與貫穿研究的主軸。例如社會學討論貴族教育時，很可能是以經驗世界的素材為基礎，從理論層面反思社會中有關權力、文化與教育的問題；自然科學討論物質最基本的構成單位時，很可能是要理解到底物質是由多小的基本單位構成，而去發明許多加速撞擊器。那麼，研究旨趣在國際關係理論之

<sup>6</sup> 本文並不認為多數的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只是研究霸權，而是世界體系論、新葛蘭西學派與歷史社會學派著墨較深。依照時間的順序，馬克思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有三個階段，1. 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理論、2. 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論、3. 歷史社會學派、新葛蘭西學派與林克雷特(Andrew Linklater)為主的批判理論。詳細的內容請參見曾怡仁，〈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之演進研究〉，《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第2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07-30。

<sup>7</sup> 到底什麼是新葛蘭西學派？其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為何？該如何運用在國際關係研究？其研究限制與展望為何等相關議題，在1998年有一次爭論。參見Randall D. Germain and Michael Kenny, "Engaging Gramsc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New Gramscia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1 (Jan. 1998), pp. 3-21; Craig N. Murphy, "Understanding IR: Understanding Gramsc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3 (Jul. 1998), pp. 417-25; Mark E. Rupert, "(Re-)Engaging Gramsci: A Response to Germain and Kenn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3 (Jul. 1998), pp. 427-34.

<sup>8</sup> 這是避免以單一個人姓名來辨識廣泛的現有理論傳統，所以依據葛蘭西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加上二十世紀晚期將歷史唯物論運用在全球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關懷，因此稱呼為跨國的歷史唯物論，見Henk Overbeek,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ies of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World Order," in Ronen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68 and footnote 1.

意涵就是討論任何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所要研究時的出發點與貫穿全部的研究興趣。本段將引介哈伯瑪斯與林克雷特的三種研究研究旨趣，以及考克斯的兩種理論目的，思考不同的研究旨趣在國際關係理論的意涵。

### 一、三種研究旨趣

一般來說，旨趣就是樂趣。「研究旨趣」是對知識的興趣，也就是要研究什麼主體、該用何種研究方法以獲取哪方面的答案，可將其分成技術的(technical)、實踐的(practical)與解放的(emancipatory)三種旨趣，這就是哈伯瑪斯認為每種研究取向都有其特殊的知識創制的興趣(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技術的旨趣是人類試圖透過技術佔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旨趣，解決自然界的不可認識與不可理解性，或者可稱之為有效地控制自然過程的旨趣。<sup>9</sup>實踐旨趣的目的並非是客觀化現實，而是維持相互理解的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消除兩個面向的溝通破裂：縱的方向是某人的個人生活歷史與其所屬的集體傳統，橫的方向是不同的個人、集團與文化的傳統之間的傳達，所以實踐旨趣是要在實踐的行為領域發展起來的。<sup>10</sup>解放的旨趣是人類對自由、獨立與主體性的旨趣，目的是將主體從依附於客體的力量中解放出來。一切批判性的科學就是在解放的旨趣之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種是社會解放，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沒有統治的交往關係與取得一種普遍的、沒有壓制的共識。<sup>11</sup>對於歸類為社會科學一種的國際關係理論，這三種研究旨趣都指導著任何一種理論與實務研究的方向，哈伯瑪斯認為解放旨趣最能展現力量，因其具有強烈的批判性質，能說明與解構結構與行動者的緊張。<sup>12</sup>若要將國際關係理論與三種研究旨趣結合，一個不錯的辦法是從林克雷特(Andrew Linklater)的論點出發。

林克雷特認為社會學研究的三種研究旨趣，與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是極為類似的。第一、技術的旨趣：實證主義(positivism)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採用許多自然科學方法論上的技巧，力求成為精確的社會科學，並以此探尋社會規則，相對應的國際關係理論是承繼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現實主義學派，他們強調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作為單一行為者與追求權力，華茲(Kenneth N. Waltz)就認為連結國家層次的意識形態與結構以及國際體系層次的方式，是無法獲得歷史證據支持，必須從國際政治中的體系結構與限制條件的

---

<sup>9</sup> 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著，郭官義、李黎譯，《哈伯瑪斯——認識與旨趣》(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1年)，譯者前言部分，頁14-16。

<sup>10</sup> Jürgen Habermas, translated by Jeremy J. Shapiro,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Oxford, UK: Polity Press, 1987), pp. 175-7. 不過實踐旨趣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暢通無阻，在現今的社會制度中，經濟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機構對社會的全面統治，壓迫著對話，使得相互理解是越來越困難，因此哈伯瑪斯後期發展溝通理性與溝通行動理論，意圖解決這樣的問題。

<sup>11</sup> 哈伯瑪斯著，郭官義、李黎譯，《哈伯瑪斯——認識與旨趣》，譯者前言，頁15。

<sup>12</sup> 對於三種研究旨趣在社會學的研究與哈伯瑪斯對三種研究旨趣的評論，請參見黃瑞琪，《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

分析，才能理解國家的行動。<sup>13</sup>第二、實踐的旨趣：詮釋學反對實證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行動者與自然科學研究的主體是不同的，實證主義會忽略行為者的能動性與行動意義，因此詮釋學關注文化與語言面向的人類行為指導並理解其背後的社會共識，相應的國際關係理論是格老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的理性主義學派(rationalism)，<sup>14</sup>他們利用無政府社會(anarchical society)描述國際社會的規範原則，亦即詮釋學的途徑理解國際社會中的合法性、共識與秩序，並從西歐國際體系擴張到全球的歷史中反思西方中心的思想。<sup>15</sup>第三、解放的旨趣：批判社會理論主張人類作為主體，擁有獨特能力去轉變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以獲得更高層次的自我決定，他們要理解支配文化對人類自主是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要將人類從社會限制與文化及溝通扭曲的狀態下獲得自由與解放，相應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革命主義學派，探討權力、秩序與解放的議題。馬克思的思想可作為革命主義的例證，他強調深化國際社會的水平分工與藉由國際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並以現存世界作為革命基礎，實現更高理想的社會。批判理論就是採用這種態度對進行社會與政治的研究。<sup>16</sup>

## 二、問題解決理論與批判理論

考克斯認為理論總是為某些人與某些目的，所有理論都有來自特定社會與政治時空位置的觀點，亦即對世界的看法是來自所處的國家或社會階級、是支配或從屬、是崛起或衰弱的霸權、是感覺的固定性或當前危機、是過去的經驗或對未來的期望。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檢驗，尤其是越為複雜的理論，背後支撐的意識形態與所隱藏的觀點。<sup>17</sup>這種理解理論的態度，與三種研究旨趣所代表的意義極為相似，差別在於兩者是反方向的。考克斯是要從已知的理論中尋找背後支撐的意識形態與觀點，而會採用何種的意識形態與觀點，與從事研究時所採取的研究旨趣密切相關。當興趣是技術旨趣時，很自然地會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途徑，建立模型並進行無數次的實驗，最後得出人類社會行為中的規範與準則；若是實踐旨趣，則可能透過語言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從歷史的證據中去尋找指導人類行為的依據與背後的社會共識；解放的旨趣多從個人實踐與歷史經驗中，探索社會行動與制約人類行動的結構，並不滿當前對於行為主體能動性的限制，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說，這三種研究旨趣就是三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與觀點，決定於研

<sup>13</sup>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p. 9-15; 對華茲的研究也請參見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sup>14</sup> 此處的理性主義主要是指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如懷特(Martin Wight)、布爾(Hedley Bull, 1932-85)、華生(Adam Watson)等人，並非是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合稱的理性主義，後者的「理性」是相對於「反思」研究途徑。參見 Andrew Linklater, "Rational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sup>nd</sup>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 Ltd., 2001), pp. 103-28.

<sup>15</sup> 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pp. 9-10, 15-21.

<sup>16</sup> *Ibid.*, pp. 9-10, 21-7.

<sup>17</sup>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2 (Summer 1981), p. 128.

究者服膺與技術層面的控制、實踐層面的詮釋與解放層面的批判。這就是本文所認知的研究旨趣在國際關係理論之意涵，<sup>18</sup>無論是從哈柏瑪斯的或是考克斯的方向，都可以討論霸權理論的研究旨趣。

進一步分析理論的目的，可以被分成兩種：問題解決理論(problem-solving theory)與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前者認為世界就如同他所發現的，有著他們所組織優勢的社會與權力關係及制度，並成為行動的架構，問題解決理論的目標是幫助解決具優勢地位的現狀之中所產生的問題，簡單地、直接地回應問題後提出解決的方式，既有的現狀將被持續地保存。後者跳離當前世界的主導秩序，而是要找出秩序是如何而來，批判理論不認為優勢的制度、社會與權力關係是理所當然的，而去關注該關係的來源與變遷過程，從歷史的研究中理解過去與變遷。當然，批判理論並非漠視現狀，而是想要超越既存的秩序。若回顧國際關係的理論史，會發現不同歷史時期對理論的偏好有所不同，權力關係穩定時就偏好問題解決理論，當權力關係流動或多面的危機時，是發展批判理論的契機。<sup>19</sup>循此脈絡，從一九八〇年代主流理論與反思理論的辯論以來，全球化的興起與美國霸權的衰退之爭所呈現的權力關係流動，是持續發展批判理論的契機。本著這樣的精神，接下來將探討主流霸權理論的三個論題與相應的跨國歷史唯物論，不同的研究旨趣：再現與超越霸權。

## 參、霸權論題：誰是霸權

霸權理論的研究必定要先定義霸權，誰是霸權？是個人、團體、國家或是跨國集團？是什麼樣的物質或精神基礎構成霸權？霸權擁有什麼可以在國際關係運作的權力？也就是說，回答上述三個基本問題後，才能了解誰是霸權。本段落分成三個小節，依照傳統霸權研究、對傳統霸權的修正、以及跨國歷史唯物論的順序，討論上述三個基本問題。同時，回歸到本文的核心，更要理解不同霸權論題的論述其出發與貫穿理論的研究旨趣。

### 一、傳統霸權研究：國家中心論

金德爾伯格針對一九三〇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研究，提出的解釋為當時可能承擔並阻止此危機發生，並負有責任的兩個國家，英國與美國並未挺身而出。<sup>20</sup>

<sup>18</sup> 其實考克斯對建構理論的本體論、知識論與研究途徑，有著相當詳細的研究，並不斷地出現在相關的著作中，這開啓國際關係領域對於這方面的辯論。對於本文而言，研究旨趣似乎可以是上述的總合，畢竟研究旨趣是所有知識研究的出發點與貫穿研究的主軸。參見 Rob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2:2 (Summer 1983), pp. 162-75; "The Way Ahead: Toward A New Ontology of World Order," in Richard Wyn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1), pp. 45-59.

<sup>19</sup>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p. 128-30.

<sup>20</sup> 金德爾伯格的第一個結論也是最重要的結論為「不對稱性」，要是世界經濟行為是對稱的，那麼將可能不會有世界經濟大蕭條，參見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pp.

英國在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自二十世紀初期就逐漸衰退，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國際聯盟實施對奧地利與匈牙利的貨幣穩定政策時，英國就沒有這樣的能力，直到1931年，英國的能力消失了；而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雖然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但是對自己的國際角色定位不清，缺乏對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興趣。<sup>21</sup>在此情況下，當時的世界貿易充滿重商主義的精神，各國採行保護政策，提高關稅與貿易壁壘，使得經濟大蕭條的範圍擴散到全球。因此，世界經濟要維繫穩定的話需要一個領導者，提供以下的責任：為剩餘產品維持相對開放的市場、提供對抗週期性的長期借貸、以及在危機中提供貼現。<sup>22</sup>其後進一步論述實證上的霸權，也就是美國在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霸權並非支配而是領導自由開放的世界貿易，不過相較於西歐與日本，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的經濟實力呈現相對衰退之後，就逐漸走向保護性貿易政策，也就是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會隨著霸權國的經濟實力下降而趨向保護主義。<sup>23</sup>

這樣的霸權研究將經濟學的公共財(public goods)概念引入國際關係理論，將不同國家的利益視為不同的私人商品，霸權國在開放的國際市場中，亦即自由市場體系中提供公共財，國際經濟的公共財是保證提供穩定的貨幣、開放自由的貿易制度與國際安全等。<sup>24</sup>有趣的是，自由市場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必須有三個前提，分別為霸權、自由意識形態與共同利益。亦即，沒有霸權則以自由市場為主的世界經濟體系就無法出現、發展。然而霸權出現之後，自由市場也不見得會出現，因為霸權國家的意識形態佔有很大的決定性，若霸權國家具有自由的意識形態則自由市場就可能出現，而共同利益是相對霸權及主要國家相互關係而言，霸權國的經濟是對世界經濟順利運轉的關鍵，其他主要國家也可以依循自由市場貿易而獲利。<sup>25</sup>至於霸權國家會採用何種運作手段，這與兩個層面有關，冷戰時期的東歐集團並未納入以美國領導的自由貿易體系，自然就難以利用強制手段擴張；其次是所屬於自由貿易體系的國家，領導國家通常會利用政治力量，要求其他國家配合以共同維繫開放的自由貿易體系。<sup>26</sup>

這樣的霸權命題確實可以回應三個基本問題。首先，霸權是國際經濟非對稱情況下具有領導地位的國家，理論推衍並沒有意味是否只有單一霸權國家的存在；其次，霸權的基礎來自於擁有國際經濟的領導地位，以及擁有自由的意識形

---

292-4. 從此處才繼續討論到，為什麼世界經濟需要由具備領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也才開啓霸權穩定論的研究。

<sup>21</sup> *Ibid.*, pp. 296-8.

<sup>22</sup> *Ibid.*, pp. 292, 303-5.

<sup>23</sup> 金德爾伯格此處擴大霸權國家對世界經濟的穩定作用，除了上述的經濟層面的政策外，也將和平納入考量。然而，他也再次強調不喜愛用霸權國(hegemonic power)，而偏好使用領導權或責任(leadership or responsibility)，參見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2 (Jun 1981), pp. 242-54;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says on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8), pp. 123-42, 185-94.

<sup>24</sup>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4-5.

<sup>25</sup> *Ibid.*, pp. 72-3.

<sup>26</sup>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5), pp. 138-62.

態，並勇於承擔提供公共財的意願；再者，霸權會利用國際關係的政治力量，要求其他國家配合霸權的行動。透過這樣的分析，可以論斷傳統霸權研究的出發點是要理解經濟大恐慌的成因與提出解決之道，受限於既有的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多以國家作為主要行為者，因此採用國家中心論的分析，放棄更寬廣的解釋途徑。

## 二、理論與實證之不足

然而，霸權穩定論的霸權論題受到理論與實證兩方面的爭論與修正。

就理論性的評析而言，可從理論的根基：公共財與集體行動邏輯的概念進行討論，次而從現實政治的利益考量著手，既然國家作為一個理性決策者，其所作為必然先求自利，他利只是附屬的行為，也就是當霸權穩定論所謂的公共財損及到國家利益時，自然會有相應的作為，亦即霸權的論題是有缺陷的。公共財又稱為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經濟學認為這是一種財貨，對於市場行為者的利益有所幫助，但卻無法由個人的成本效益分析中獲得，這是因為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與共享性(jointness)，前者是任合行為者都不能排除其他行為者使用此類財貨的權利，後者是各行為者的使用並不會妨礙其他行為者之使用。<sup>27</sup>若將公共財的原則類比到國際貿易，表示在霸權主導下的自由貿易必然是非排他性與共享性的，任何國家都能享用該權利，且不會妨礙他國的使用。然而，自由貿易並非是經濟學的公共財，自由貿易不具有非排他性，霸權可以影響高度貿易壁壘的國家，讓他們無法享受自由貿易的好處，也就是排除其他使用者使用這類財貨的權利。相反地，各國並非聽從霸權的領導，多數是為了本身國內與國際的需要，而加入自由貿易體系中。<sup>28</sup>自由貿易也並非是共享性的，霸權提供剩餘產品的銷售市場，但霸權的吸收能力卻是有限度的，並容易透過保護措施防止外來品進口，也就是霸權內部使用該自由貿易市場之際，影響到其他國家的使用權利。<sup>29</sup>自由市場並不是完全的自由，是受到霸權在各個歷史時期相應經濟地位，以及國際政治發展情形的影響，英國與美國的霸權地位與國際經濟秩序並沒有絕對的關係。<sup>30</sup>

其次就實證方面而言，英國與美國在經濟大恐慌研究分別是具有領導地位的霸權國。但只要比較英國在霸權階段末期的經濟實力而言，<sup>31</sup>1870年時，以英國

<sup>27</sup>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143-4.

<sup>28</sup> Timothy J. McKeown,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19<sup>th</sup> 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1 (Winter 1983), pp. 74-87.

<sup>29</sup> Isabelle Grunberg, "Exploring the "Myt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4 (Autumn 1990), pp. 442-3.

<sup>30</sup> 對這段歷史的描述與分析，斯坦因(Arthur A. Stein)提供簡潔但完整的回顧。參見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2 (Spring 1984), pp. 355-86.

<sup>31</sup> 早期的霸權研究並未提出哪些指標作為霸權力量的比較，魯塞特(Bruce Russett)在整理相關數據與參酌權力指標後，以代表國內經濟力量與市場大小的國民生產毛額(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代表相對軍事實力的軍事支出以及經濟與軍事力量基礎資源的製造業的產出等三項



的指數作為 100，國民生產毛額依序為：美國與俄羅斯(117)、英國(100)、法蘭西(86)，軍事支出：俄(127)、法(119)、英(100)、德意志(68)，製造業產出：英(100)、中國清帝國(75)、美(51)、法(37)，<sup>32</sup>也就是在三項指標中，英國就有兩項未居於優勢地位。那麼英國在 1870 年是否擁有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以及霸權國地位，這是有疑問的。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英國的指數作為 100，國民生產毛額：美(306)、俄(123)、德(113)、英(100)，軍事支出：德(129)、俄(125)、英(100)、法(99)，製造業產出：美(235)、德(109)、英(100)、俄(26)。<sup>33</sup>很明顯的美國已經是世界最強的經濟體，英國落後於美國、俄羅斯與德意志之後，純粹就數據而言，英國已經不具有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這如同英國對自身在歐洲權力運作的定位為「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並未負起領導地位的角色。此時各區域的領導者應為德意志帝國、法蘭西第二共和、美利堅合眾國、俄羅斯帝國等，這表示大英帝國並不具有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

實證研究唯一的例證是美國，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除了軍事花費遠低於歐洲強權與日本之外，其餘兩項指標都大幅超越其餘國家，取得優勢的相對地位。尤其是 1950 年的數據更能顯示美國的霸權指標，以美國的數據為 100，國民生產毛額：美(100)、蘇(29)、英(19)、法(13)，軍事支出：蘇(106)、美(100)、中(18)、英(16)，製造業產出(1953)：美(100)、蘇(24)、英(19)、西德(13)，<sup>34</sup>可見美國確實具有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也承擔起霸權的責任。<sup>35</sup>然而目前的實證研究只能找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為唯一例證，<sup>36</sup>若從一個有效的例證就推論世界經濟需要一個願意承擔穩定責任的霸權，其所能代表的只是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甚至是為美國霸權辯護。

對霸權穩定論的評析，就理論部分而言，最主要是反對將霸權國負起的責任視為公共財，尤其是自由貿易部分。這樣是否定擁有自由意識形態的霸權是善意的，也認為公共財不僅是要考慮國際經濟的層面，必須連結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才能有更充分的論證。實證部分則著墨於十九世紀英國與二十世紀美國的權力與對世界經濟秩序的责任承擔兩方面，英國被排除在霸權研究的歷史證據，唯

---

作為霸權力量的指標，見 Bruce Russett, "The Mysterious Case of Vanishing Hegemony; or, Is Mark Twain Really Dea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2 (Spring 1985), pp. 208-11.

<sup>32</sup> *Ibid.*, p. 212. 另外在此省略 1830 年的資料，當時為梅特涅(Klemens W. N. L. von Metternich, 1773-1859)主政下的歐洲和平。

<sup>33</sup> *Ibid.*

<sup>34</sup> *Ibid.*

<sup>35</sup> 最重要的就是 1944 年布列頓森林(Bretton-Woods)體系的創立，美國領導主要工業化國家創造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以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為基礎，建立起有助於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的金本位國際貨幣秩序，以及經濟發展的貸款。也因此，本文認為美國是霸權論題的唯一例證。

<sup>36</sup> 吉爾平提出新的辯護，他認為雖然理論上沒有霸權的情況下，雖然存在合作解決與創造和維持自由國際經濟的可能性，這種情況卻從未發生過，也就是沒有任何的歷史證據。相對於霸權理論假定要建立一個自由的國際經濟，霸權是一個非充分條件，而是必要條件，且有可以證實的歷史，霸權穩定的論證較為可靠。另外，他也認為沒有的霸權理論提倡者的動機是要正當化美國的行為。參見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3-5.

一的證據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這部分，批判的學者從理論假設、研究層次與歷史證據等三部分出發，雖然辯論多集中於原始的討論，但是擴大原先的國家中心論以及為現狀辯護的動機，意味著影響國際經濟的因素不僅是國家。而霸權力量衰退的議題就繼承著這樣的概念。

### 三、社會力量與霸權

跨國的歷史唯物論意味著將歷史唯物論的方法，應用在跨國社會關係的研究上，理論根基包括：對社會生產關係研究的重視、採用辨證的理解方式討論動態與現實、以及抽象的研究方法。並且認為資本累積與階級形成是國家形成與國際政治的重要關鍵。<sup>37</sup>換言之，這是對新現實主義觀點的四項修正：一、對衝突的關心，從新現實主義視之為肇因人性的循環結果之結構，轉變為結構變遷的可能原因；二、對帝國主義的看法，歷史唯物主義增加權力垂直面向的研究，例如都市與鄉村、中心與邊垂在世界政治經濟的主導與附屬關係；三、除了國家理性之外，更關注於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關係；四、歷史唯物論將生產過程視為解釋特殊歷史形式之國家與社會複合體的關鍵要素。<sup>38</sup>接著描述歷史結構，主要由三種力量交織而成，一、物質能力(material capabilities)：生產與破壞的潛能，動力來自科技與組織能力、轉換自然資源的累積形式、設備的蓄積等；二、理念(ideas)：一種是包含交互主觀的意義，就是社會關係本質上的共享觀念，另一種與歷史結構有關的，是不同人類團體對社會秩序的集體意象，亦即權力關係的正當性與本質；三、制度(institutionalisation)：是穩定與存續特定秩序的手段，顯示著優勢的權力關係，通常是現存的權力關係。這與葛蘭西的霸權概念密切相關，因為制度提供內部解決衝突的方法，也可用來打擊反對者。與此三種交織力量的比擬是社會力量、國家形式與世界秩序三者的交織。<sup>39</sup>

除了研究方法的特殊性，跨國歷史唯物論的霸權概念源自於葛蘭西，霸權最簡短的定義為：植基於同意更甚權力的階級權力之面向，尤其是布爾喬亞霸權。<sup>40</sup>於是結合三種力量與文化霸權的概念，霸權就必須從生產的組織，特別是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力量觀察，因為社會力量能穿越國家疆界，可以形成世界結構。易言之，權力是從社會過程中形成的，而非物質能力的累積而來。<sup>41</sup>而循著

<sup>37</sup> Henk Overbeek,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p. 168-9.

<sup>38</sup>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p. 134-5.

<sup>39</sup> Ibid, pp. 135-8.

<sup>40</sup> Roger S. Gottlieb, *History and Subjectiv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t Theo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93[1987]), pp. 110-4. 相當多的文獻都有討論葛蘭西的霸權與文化霸權之涵義，但本書最有趣的是，葛蘭西無視於性別壓迫，忽略男性對於女性的壓迫，這似乎會破壞他的文化霸權理論。

<sup>41</sup>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 139. 考克斯進一步認為生產的社會關係要從三個不同的分析之道，分別是生產的社會脈絡，亦即該生產什麼與如何生產；有關生產過程內部，就是生產的互補性，或是專業分工；生產報酬的分配，決定於顧客，或是社會力量的結構。透過這樣的分析才得以理解生產關係、生產的社會關係與生產的權力關係(三者只是差別在表達方式)，也就是社會力量與歷史的關係，參見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歷史回顧，考克斯討論 1845 年以來的霸權與世界秩序，認為共分成四個階段：一、1848-75 年，以英國為核心的霸權階段，推動比較利益、自由貿易與金本位的經濟概念；二、1875-1945 年，是非霸權時期，英國優勢地位不再，第一階段的經濟概念退卻；三、1945-65 年，以美國為核心的新霸權世界秩序，與英國十九世紀中葉的情況類似；四、1965-80 年，美國霸權的運作不再順利，世界秩序面臨三種可能的結構轉變，分別是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擴大政治的管理、主要經濟強權對經濟領域的分裂、以及第三世界的反霸權行動。<sup>42</sup>

但霸權若只是個國家，這不符合跨國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根基。雖然歷史上的霸權是透過社會與經濟革命為基礎產生的強權國家，但是其結果卻是將社會與經濟革命的結果擴散與穿透國界，換言之，世界霸權就是建立在某一主導社會階級向國際擴張而開始的，經濟與社會制度、文化、科技都將隨著其他國家的仿效而擴散，世界霸權可以被描述為社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結構。<sup>43</sup>換句話說，霸權是對當時秩序背後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之理解，並不僅只限於單一國家或國家體系，而是穿透國家的疆界，進入到社會之中，亦即霸權是主導國家的社會統治階級，他們所想和所作的獲得了其他國家統治階級的默許，是核心與邊陲社會的精英份子結合的聯盟，並透過其所支配的全球政治經濟組織來實踐的。<sup>44</sup>

二戰之後的美國霸權，其物質生產基礎來自強調大量生產制度化的福特主義(Fordism)，以及相關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在國內與國外的擴張。這種複雜的過程牽涉到美國政治人物、來自世界經濟核心國家的資本家與擁有中立及生產取向政治共識的勞工，所形成的歷史集團(historic bloc)，共同組成霸權。<sup>45</sup>總而言之，跨國歷史唯物主義對霸權的定義雖然有所不同，但都強調三個重點：權力來自於生產過程的社會關係所產生的社會力量；霸權的支配並非僅限於單一國家，是許多階級聯合所形成的跨國歷史集團，透過物質生產、理念與制度而形成的支配；社會力量、國家形式與世界秩序間存在著相互交織的互動關係，而非僅是單一因素形成霸權。上述三個重點就回答了本段落的三個基本問題，霸權的組成、形成的力量與可運用的力量。跨國歷史唯物論對霸權論題的研究比起霸權穩定論，是更加寬廣，抹去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深入社會力量所形成的原因。這樣的研究旨趣是找回人與階級在國際關係中的能動性，找回社會力量在世界秩序種所扮演的角色，是對於歷史的重視，跳脫對於現狀的維護，而逐步地理解霸權背後的各項組成，進而批判既存理論的不足。

---

Press, 1987), pp. 11-3.

<sup>42</sup> Rob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70-1. 後來考克斯重新回顧歐洲近代歷史，依據國家形式的轉變與隨之轉移的生產關係模式，重新研究霸權時期，三個時期為：自由國際經濟的到來(1789-1873)、敵對帝國主義時期(1873-1945)、與新自由世界秩序(1945-)，參見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pp. 105-9.

<sup>43</sup> Rob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71-2.

<sup>44</sup> 曾怡仁，〈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之演進研究〉，頁 121-2。

<sup>45</sup> 歷史集團不僅是社會力量的聯合，是被共同意識形態保護下，植基於物質社會關係與單位的優勢社會力量。Mark Rupert, *Producing Hegemony: The Politic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 29-30.

## 肆、熵論題：誰在乎霸權衰退

熵的原始概念來自熱力學第二定律，簡潔的解釋方式為自發性的演化朝向熵值較大的方向進行，任何不去控制的系統必然會趨向熵值最大的方向演化，最後形成均勻分布的情況。此處霸權研究的熵論題借用該概念，認為原先集中在霸權的能力與形成的秩序，最終將有系統地分散到整個體系之中，也就降低霸權的地位。這個論題是接續霸權論題而來，既然定義與理解霸權之後，那麼他的興衰就與霸權秩序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熵論題包含兩個面向，其一是霸權為何會衰退，原因是來自霸權內部或外部，其二是何種程度才能稱為霸權衰退。

### 一、霸權的擔憂

霸權的能力衰退到何種程度才能稱為霸權衰退，這必須先討論霸權對現存秩序的控制，也就是對現狀的維持。國內的控制機制有五個構成要素，政府、權威、財產權、法律與國內經濟，應用在國際關係就是強權的主導、威望等級(hierarchy of prestige)、領土界線、系統的規則與國際經濟。綜合而言，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威望等級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等三項是觀察國際秩序的指標，<sup>46</sup>權力分配是決定誰統治國際體系，以及誰的利益將在該國際體系中被提倡，霸權體系就是單一強權國家控制或主導其餘國家；威望等級，國際威望類似國內權威，是確定體系內其餘國家會遵守主導國家的命令；國際建制則是霸權所倡議而成為國際體系成員國行為與的準則。<sup>47</sup>若是霸權無法繼續在權力分配、威望等級與國際建制發揮主導的控制與影響力，就表示該系統的現狀無法持續，從歷史的觀察而言，這是種長期而緩慢地衰退過程。<sup>48</sup>然而，這樣的控制機制是從國內政治運作的觀察類推而得的，將國際政治運作與國內政治運作視為類似的機制，一方面削弱霸權論題的國家中心概念，因為國內運作的行為者包括個人、組織、團體或是階級，國際運作則只有國家；另一方面突顯疆界的重要，坐實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討論。有趣的是，這兩方面是互相矛盾的。本文認為定義霸權與霸權秩序衰退的研究旨趣在於對霸權本身與霸權秩序的擔憂，顯示對於既存秩序的偏好，亦即霸權現狀是必要的且帶來好處的。

定義何謂霸權衰退後，接著要理解霸權衰退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市場力量的解放與發展需要一個有利的政治環境，但國際市場的運作通常是按照本身的邏輯，自由市場的經濟競爭與價格機制會讓增加生產效率、經濟分配與各國市場的

<sup>46</sup> 國際建制在原始文章(Gilpin, 1981:34)並未出現，當時的引用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用法“the governance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a set of rights and rules that govern or at least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s.”有關國際建制的部分請參見下一段落。

<sup>47</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7-38.

<sup>48</sup> 這是許多長週期霸權理論的綜合觀察，多數的結論是霸權週期短則五十年或是百年，長則千年，前者如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後者如威尼斯等。主要的差別是如何定義霸權，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

相互依賴。也就是自由的貿易改變各種經濟活動與生產，影響到國際經濟能力與工業能力的再分配。換言之，自由的市場經濟運作邏輯，讓原先處於邊陲的國家逐漸上升到半邊陲區域，霸權秩序也就受到影響，雖然兩者能力的絕對值都在提升，但他們的相對差距卻是逐步遞減。因此，資本主義市場與自由貿易的運作邏輯破壞了霸權秩序的現狀。<sup>49</sup>第二個原因與公共財與搭便車者的問題有關，首先是霸權爲了要維持所提供的公共財，如提供剩餘產品維持相對開放的市場、提供對抗週期性的長期借貸、以及在危機中提供貼現等，這會逐漸減少霸權的經濟剩餘，依據邊際收益遞減法則，霸權在提供公共財的成本與獲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提供越多的公共財就會使得邊際收益減少越多；其次，搭便車的國家在享用公共財所獲取經貿利益之後，卻只需要付出少許成本，例如不支付軍事開銷卻享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環境，採取高關稅與貿易壁壘卻享受低關稅的優惠等。最終，霸權爲了維繫公共財而付出超過原先維持國際秩序的費用。<sup>50</sup>

霸權對於國家本身的主要影響可以歸結爲，面對其他國家經濟的相對快速成長，霸權本身經濟結構的僵硬性，以及霸權不成比例的支出以維護公共財，造成的經濟負擔。<sup>51</sup>簡言之，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以及搭便車者所造成的負擔，導致霸權的衰退；這兩項卻又是霸權穩定論的兩個實證例子，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所賴以支撐世界秩序的支柱。熵論題是命定的，霸權注定要衰退，只要持續維持所建立的霸權秩序，就必然會損及霸權本身的能力。從該面向觀察，熵論題是霸權的擔憂，擔憂本身能力與霸權秩序的衰退，更深層的關注是延續霸權論題，認爲世界經濟需要一個穩定者提供公共財；若否，這樣是令人擔憂的。亦即，研究旨趣是持續霸權論題，並憂心熵論題的影響，最後提出後霸權論題。

## 二、對霸權衰退的修正

對霸權衰退的修正，可從熵論題的兩個面向討論，分別是霸權衰退的定義，與霸權衰退的原因。

就霸權衰退的定義而言，必須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威望等級與國際建制等三項指標著手。若是霸權已經無法在這三項指標中取得優勢的主導地位，那麼霸權確實是衰退了，且該過程不必然是持續地、緩慢地衰退，三項指標也難以在一夕之間反轉。熵論題若要成立，必須是三項指標平均地分配到國際體系，這與 1970 年代提出熵論題的時空背景有關，越南戰爭(1955-75)、石油危機(1973)、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終結(1973-6)與廣場協定(Plaza Agreement, 1985)的出現，讓人們逐漸地注意到熵論題，也擔憂霸權衰退所帶來的秩序問題，<sup>52</sup>擔憂霸權衰退立

<sup>49</sup>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77-8.

<sup>50</sup> *Ibid.*, 78-9, 88-9.

<sup>51</sup>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 148.

<sup>52</sup> 這四個事件確實影響到美國在霸權秩序中的權力分配、威望等級與國際建制的主導能力，越南戰爭是美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撤退，令人擔憂東南亞的骨牌效應；石油危機顯示主要產

場的研究紛紛出籠。布列頓森林體系企圖解決國內自主與國際準則的矛盾，避免國內經濟活動服從於傳統金本位制度的匯率穩定，以及避免戰間期因國內政策自治而犧牲國際貨幣穩定，透過該體系協調國內干預與國際穩定，創造二次世界大戰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sup>53</sup>美元按照 35 美元兌換 1 盎司黃金的固定比率，於是美元等同於黃金，成為比黃金還要有用的流通貨幣，美國就是世界銀行；之後，有鑑於美國內部的通貨膨脹與維繫國際經濟秩序的力量減弱，尼克森政府(1969-74)中止美元兌換黃金，世界貨幣體系從金本位轉變成美元本位，大幅度貶值美元，1973 年世界主要國家決定讓將固定匯率改為浮動匯率，布列頓森林體系自此告終。<sup>54</sup>

然而反對熵論題者從另一面解釋，既然美國能瓦解布列頓森林體系，就表示美國仍在世界經濟、貨幣、貿易與金融方面，擁有強大的力量，否則如何迫使其他國家接受這樣的新國際秩序。體系的終結就本質而言，能力較少的一方必須依照有能力的一方之組織進行調適，有能力者則擁有不必改變的權力。因此體系的終結是美國面臨許多承諾之間，例如增加戰爭費用與國內的大社會計畫，當要對現對國內的社會契約而選擇通貨膨脹，進而調整美國對外的機制，導致體系的終結。霸權國家只要能成功地要求其他國家調整，就得以維持優勢主導地位，熵論題不攻自破。<sup>55</sup>甚至是十多年後的廣場協定，也是在美國要求下而迫使其他國家調整。從國際貨幣的使用組成而言，美元在 1975-7 年佔有接近八成的使用量，比起 1960 年代的六成到七成，顯示美元依舊是最主要的國際流通貨幣。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只是自 1950 年代末期展開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的延續，而非美國權力的衰退。<sup>56</sup>

霸權衰退的原因有二：自由貿易市場的運作邏輯，以及付出過量的公共財與搭便車問題。對其修正的討論仍然回到公共財是公共的或是私有的，就貿易理論而言，霸權秩序是霸權國家所創造的，必然能利用主導能力影響貿易條件。假如霸權要獲得最大的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就要採用自由的貿易政策；若要獲得最大的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就要採用保護政策，回歸到理論假設霸權是自利行為者，也就是要採取自由或是保護的貿易政策，與霸權地位沒有絕對關係。而熵論題卻論證霸權衰退是必然的，更多牽涉到的吉爾平認為霸權是否要承擔穩定者的責任，維持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需要自由意識形態與共同利益的輔佐才行。<sup>57</sup>反對熵論題的另外一種看法是美國霸權衰退，其實是美國利益的轉移，這反駁了霸權衰退的原因。利益的轉移是來自對權力的重新定義，包括國際體系的

---

油國結盟的實力，美國不具對該組織的主導能力；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終結與廣場協定則顯示美國需要盟友的協助以解決國際經濟秩序的問題。對以經濟與貿易為主的霸權穩定論，後兩者的影響是至關重要。

<sup>53</sup>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31-3.

<sup>54</sup> Ibid, pp. 140-1.

<sup>55</sup>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 149.

<sup>56</sup> Andrew Walter, *World Power and World Money: The Role of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 187-90. 參見 Figure 6.3 與 Table 6.6.

<sup>57</sup>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72-3.

權力來源是多樣的，並非只著重於貿易與貨幣；權威的來源有分散的趨勢，美國對世界秩序控制的能力雖有減弱，但不意味這些控制力是轉移到其他國家，而是非國家行為者與市場；國家行動的影響力越來越分散。<sup>58</sup>若霸權對利益觀念改變，自然就會影響既存的霸權秩序，並透過新的調整，尤其是要求其他國家的調整以配合新霸權秩序，再次突顯霸權的主導地位。

修正何謂霸權衰退與霸權衰退原因兩部分的討論，首先是重新確認權力分配、威望等級與國際建制，以及權力與利益的轉向，這部分的視野超越現實主義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重商主義學派的觀點，透過將國內與國際、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的連結，理解霸權與秩序的之外的內涵；其次，國際貨幣與金融秩序的歷史研究，否定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美國霸權的衰退，而是霸權能力的展現，亦即，不能僅從事物的表象去推斷真相，應該從長期的歷史與權力運作情況著眼，方能超越熵論題的命定。經由對霸權論題與熵論題的反思，其研究旨趣並非僅是關注誰是霸權與霸權衰退所帶來的秩序問題，而是重新思考權力與霸權為何，秩序不過是利益轉向的重新排序。跨國歷史唯物論將進一步論述生產模式、跨國歷史集團與熵論題的關。

### 三、生產模式的改變

跨國歷史唯物論的霸權概念迥異於霸權穩定論，當後者的熵論題著眼於自由貿易市場的運作邏輯，以及搭便車者對霸權能力的影響時，前者從生產模式與跨國歷史集團的變遷了解霸權衰退。

19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福特主義最聞名的生產力成長開始拋錨，停滯性通貨膨脹拉開福特主義生產模式的落幕，引起資本與勞工階級從新思考本身。美國藉由大規模生產所創造的經濟優勢在1966年達到極限，引發的通貨膨脹促成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也就是既有的生產模式在國際經濟的優勢，受到其他生產模式的挑戰，導致霸權衰退。<sup>59</sup>另外，生產模式不僅是生產力，還包括生產關係(relation of production)，對照於福特主義在生產力的相對衰退，其生產關係也改變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勞工的薪資成長率與生產力大致維持相等的水準，也就是利益是由資本家與勞工階級共享；到了70年代，勞工階級的所得增加遠不如從前，實質所得甚至是負成長，也就是生產關係也改變了。<sup>60</sup>所以霸權的衰退是生產模式的改變，是既有的共同意識形態受到挑戰，相較於霸權穩定論的熵議題，跨國歷史唯物論著眼於生產模式與共同意識形態的改變。

另外一種分類是將戰後美國霸權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整體的(integral)霸權：1944-60，美國擁有壓倒性的物質力量，藉由布列頓森林體系與馬歇爾計

<sup>58</sup>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 150-3.

<sup>59</sup> Mark Rupert, *Producing Hegemony*. pp. 175-6.

<sup>60</sup> Mark Rupert, "Class, 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USA," in Craig N. Murphy, (ed) *Egalitarian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03), pp. 13-21.

畫(Marshall Plan)，以共識的領導型態，與傳統的及凱恩斯學派的意識形態，形成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為基礎單位的霸權；第二階段是衰退的(declining)霸權：1960-71，美國面對國際貨幣問題時，要求主要經濟國家分擔責任，以協商的方式，與社會民主及凱恩斯學派的意識形態，仍是以大西洋主義為基礎單位的霸權，國際秩序的成本與利益均分；第三階段是最小的霸權：1971-90，霸權地位已經大幅下降，組成的單位是精英之間的協力合作，以強調市場力量與出口導向的新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sup>61</sup>這樣的分類，強調霸權是哪些人所組成、意識形態為何、以及國際秩序的利益分配等三方面，尤其是意識形態是共識、協商或單邊最為重要。換句話說，跨國歷史唯物論論述霸權衰退，關心的是主導的意識形態是否有所鬆動，給予新的共識發展的契機；另一方面，生產模式的改變影響霸權內部主導階級對其餘階級的掌控能力，導致霸權的衰退。總體而言，跨國歷史唯物論不大關心霸權必然衰退的論題，而是去理解生產模式變化的過程中，哪些行動者獲利與損失，與伴隨而來霸權衰退的解放契機。這樣的研究旨趣承繼霸權論題的關懷，找回人與階級在國際關係中的能動性，找回生產模式與霸權的關聯性，並不急於維護既有的霸權與霸權秩序，顯然，誰在乎霸權衰退？不是跨國歷史唯物論，他們所在乎的是轉變的契機，也就是超越霸權的可能性。

## 伍、後霸權論題：再現或超越霸權

後霸權論題是延續熵論題，若熵論題是必然的結果，那麼霸權與霸權秩序將如何持續？霸權穩定論的新分支，<sup>62</sup>亦即提倡國際建制以延續霸權秩序的學派，順理成章地再現霸權，可謂是霸權復振。後霸權論題提出之後，逐漸地成為霸權美國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國際經濟事務的行為準則，因此本文認為自 1990 年代以降，環繞著美國霸權衰退與再現的爭論，可以檢視後霸權論題與國際秩序的關係，並重新理解霸權衰退與後霸權的關聯性。最後，跨國歷史唯物論從迥異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視野出發，認為改變中的生產模式會影響到歷史集團對於霸權的主導權，浮現中的全球化將鬆動現有的歷史集團，從社會力量、生產模式與全球化的解釋，將超越現有霸權。

### 一、國際建制：再現霸權

國際建制提出時定義為「一組被一群國家共同接受的相互期望、規則與規

---

<sup>61</sup> Alan W. Cafruny, "A Gramscian Concept of Declining Hegemony: Stages of U.S. Power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David P. Rapkin, (ed.) *World Leadership and Hegemon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0), pp. 106-14.

<sup>62</sup> 雖然基歐漢與奈伊(Joseph S. Nye)1977 年藉由討論國家在國際建制下的相互合作關係，而被稱為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創立者，這吻合新自由主義強調合作的觀點，並加入新制度主義的研究，參見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本文認為在 1984 年的討論卻處處顯示，基歐漢的論點是延續霸權穩定論對霸權衰退後秩序的研究，因此屬於霸權穩定論的分支。並請參見下文分析。



範、計畫、組織的動力與財政的承諾」。<sup>63</sup>其後，國際建制的概念又持續的擴大，普遍被接受的定義為「在國際關係領域內，植基於某些潛在的或明顯的原則、社會規範、規則、與決策程序，各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期望」。<sup>64</sup>這與霸權論題與熵論題的假設有些不同，前兩者較偏向國家中心論，唯有自由意識形態的霸權，才會承擔起國際經濟的穩定角色。而國際建制擴大國際社會中的行動者，國家不僅會依照本身的利益而動，也會受到國際建制的影響。<sup>65</sup>

延續國際建制的論點，基歐漢在霸權穩定論的熵論題後，提出霸權之後的論題，解釋後霸權秩序與國際建制的關係。<sup>66</sup>首先，霸權是享有物質資源優勢，尤其對於生原料(raw materials)、資本、市場與高附加價值物品的相對生產優勢等的掌控，霸權的軍事能力只需控制世界政治經濟的重要區域即可；其次，霸權不能僅憑恃物質與軍事優勢就主導世界經濟秩序，這樣的代價過於昂貴，必須憑藉著意識形態的集體意識，方能達成霸權優勢。<sup>67</sup>因此，霸權藉此主導地位創造秩序。但合作並非對偶於霸權，反而是霸權依賴於他所支持與維持的某種不對稱合作。也就是霸權衰退後，國際建制仍然運作如常，乃因為建立新的建制要比維持現有建制的成本為高，各國不願意放棄先前所投入的成本與建制帶來的好處。<sup>68</sup>回歸到霸權本身的考量，當霸權面臨熵論題，無法付出過多成本維繫所創立的國際建制，會依循國際建制的論點而利用國際建制來取代霸權部分的原有功能。尤其是霸權主導的國際建制規則是明確的，受到良好遵守的，就算霸權衰退也不會立即影響到國際建制的運作。霸權面臨衰退時，就利用國際建制以延緩衰退的過程。<sup>69</sup>透過國際貨幣基金、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與產油國組織的實證研究，更加深後霸權論題的理論正確性。<sup>70</sup>

<sup>63</sup>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9:3 (Summer 1975), p. 570. 魯傑將建制的目的分成三類：獲取新的能力、有效運用現存能力、與處理使用能力的後果；建制手段分成四種：對國家行為的共同架構、協調國家行為的聯合手段、整合國家行為的共同政策、以及替代國家行為的共同政策。以上的三乘四的矩陣可以組成十二種建制。

<sup>64</sup>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sup>65</sup> 有趣的是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建制是霸權因應本身能力，而逐步發展用來約束其他國家，以維持霸權秩序的機制，當霸權衰退之後，國際建制也會緩慢地衰退。但是，後霸權論題者(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建制雖然是霸權所創立，但在運作過程中會逐漸產生獨立於霸權之外的影響力，霸權衰退與國際建制衰退並沒有絕對的關聯性，因此國際建制是國家行為與國際權力分布的中介變項。參見 *Ibid*, pp. 8-9.

<sup>66</sup>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67</sup> *Ibid*, pp. 32, 39-41, and 43-6. 此處有一個被多數人忽略的因素：民族主義。基歐漢提出與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相同論點，亦即霸權無法利用強大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powerful ideology of nationalism)，這個只能及於國內，但其他敵人確能利用並藉此削弱霸權意識形態。另外，基歐漢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解釋文化霸權，頗有廣納百川的胸懷。

<sup>68</sup> *Ibid*, pp. 49, 100-3.

<sup>69</sup> *Ibid*, pp. 49-51, 206-10.

<sup>70</sup> 也有對後霸權論題的批評，尤其是來自霸權穩定論的提出者金德爾伯格。主要批評如下：1. 霸權之後的建制有多大可能性被終止；2. 經濟霸權與政治—軍事霸權能否攜手合作；3. 缺乏經濟霸權領導下，能走向經濟合作嗎？4. 缺乏霸權主導下，各國願意不公平的分擔成本嗎；5. 危

後霸權論題的本意並非要維繫霸權的地位，而是討論霸權衰退後的國際建制運作，以及後霸權的國際秩序問題，本質上為問題解決理論，是替衰退的霸權現狀作嫁。對於承繼霸權論題與熵論題的思路而言，霸權卻可以藉由國際建制的創立而降低維繫公共財的成本，進而減少霸權領導地位應有的責任，但卻仍持續地主導著國際秩序，換言之，後霸權論題的研究旨趣是藉由國際建制以再現霸權，尤其替霸權穩定論最重要的例證—美國，作出良好的政策建議。另外，回顧歷史中霸權面臨衰退的危機，通常會採取兩種方式。第一，調整國內社會經濟制度或生產模式，著力於制度與科技創新，提出新的意識形態論述，重新贏回物質與思想兩分面的優勢主導地位。第二，不損及霸權的領導地位下，減少國際承諾，降低維繫霸權秩序的成本，例如透過國際建制等手段。後霸權論題就是第二種方式。<sup>71</sup>霸權穩定論三個論題的研究層次都是國際層次，才導致後霸權論題只著重第二種方式，較少考慮第一種方式。通常霸權是兩種方式並用，畢竟兩者相輔相成。對於採取何種方式的爭論，延續到對廿一世紀初期美國霸權的爭論，也就是後霸權論題是個不完整的答案。

## 二、美國霸權的爭論

從 1973 年掀起美國霸權衰退的爭論後，國際關係學界持續關注霸權穩定論的發展。尤其是 1990 年代的蘇聯解體、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美國經濟持續擴張與全球化等重大變遷影響，更緊密聯繫霸權穩定論與美國霸權的討論。本文認為，對美國霸權的爭論就是對熵論題與後霸權論題的爭論，要是美國霸權仍居於全球的領導地位，那麼表示美國藉著後霸權論題的國際建制或是內部調整，以克服熵論題的必然衰退論，並突顯與加深兩個論題的內在矛盾。

首先是對美國現狀的評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自從 1945 年之後，美國就成為霸權，這表示美國是最強大的國家，其經濟能力可讓貨物銷售到世界各地，軍事能力舉世無敵，也擁有創造強大聯盟的能力（如 NATO、美日聯盟等），而文化上則是世界的中心。<sup>72</sup>經濟層面，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讓美國的經濟持續擴張，2002 年國內生產毛額突破 10 兆美金，目前為 12.49 兆(2005)，約為全球數值的 27%。<sup>73</sup>比起 1950 年佔有全球數值的 50% 是衰退不少，但與其他四強的比率差距極大。就軍事層面而言，從第一次波灣戰爭(1991)到第二次波灣戰爭(2003)，美國以優越的戰場表現展示了強大

---

機與霸權的關係為何；6. 沒有霸權之下，各種權力階層的國家將如何形成建制。參見“Hierarchy Versus Inerti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4 (Autumn 1986), pp. 846-7.

<sup>71</sup> 這方面的精采論述請參閱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sup>72</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U.S. Weakness and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Monthly Review*, 55:3 (July 2003), p. 23.

<sup>73</sup> 2005 年的 GDP 排序如下(單位：兆美金，以美國為 100)：美國(12.49, 100)、日本(4.57, 36.6)、德國(2.80, 22.4)、中國(2.22, 17.8)、英國(2.20, 17.6)，相較於 1950 年的數據，美國仍佔據世界經濟的優勢地位。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06).

的軍事實力，巡弋飛彈、精準炸彈、C<sup>4</sup>ISR、後勤補給等能力都讓其他國家無法比較，美國 2004 年的國防預算已經超越 4000 億美金，遠比中國、日本等國家為多。總之，美國以經濟規模、科學技術能力、地理位置、軍事力量與聯盟等硬權力(hard power)，結合普世文化與自由的國際建制等軟權力(soft power)而形成國際主導權，未來的美國持續以科技領導能力、軍事與經濟規模結合軟權力以及作為國際溝通的中心，繼續成為領導國家。<sup>74</sup>這部分論述美國霸權為何能在 1973 年所謂衰退之後，仍持續保持霸權的優勢領導地位，最主要原因有二：來自於內部調整的影響，包括制度與科技的更新，促成二戰後最長的經濟擴張期；來自國際建制的影響，美國藉由國際貨幣與貿易組織，積極地推動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政策，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連結國內調整，擴張美國的物質能力，並推動全球民主化運動，<sup>75</sup>2002 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提到維護人類尊嚴的渴望，美國必須保護自由和公正，這是全球都應該尊追求的，例如：法治、限制國家的絕對權力、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司法平等、對宗教種族的包容以及尊重私有財產等。<sup>76</sup>國際建制只能說明美國霸權復甦的部分原因，有一大部分是來自於國內制度與科技的進步，後霸權論題可以解釋霸權對外的行為與國際建制的功能，卻不是一個完整的論題。

有趣的是，從美國對外的經濟、政治與軍事的作為，似乎可以將霸權穩定論作為指導。首先，霸權國家是恪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其社會目標與國內權力分配必須有利於國際自由秩序，對於自由市場體系的建立秉持正面態度，會鼓勵而非強迫其它國家遵守開放性自由經濟的規則；其次，經濟方面，霸權國會維持自由經濟市場制度，也提供市場、讓資本穩定地流動等。並隨時調整國內的社會經濟制度，發展尖端科技減緩自身經濟的相對衰弱。最重要的就是維持自由開放的經濟市場；第三，政治方面，霸權國家提供穩定的自由世界經濟之後，相對實力會下降，因此在不損害本身的國際地位之下，會減少國際承諾以降低成本，常見的方式透過聯盟分擔區域的國際秩序。並會透過多國合作發展國際制度，取代部分霸權的部分地位。第四，軍事方面則維持強大的軍事能力，但會透過區域聯盟的方式維護各區域的秩序與和平。

對美國霸權的研究，論證熵論題與後霸權論題之間的矛盾，霸權面對衰退時，可以藉由國際建制解決過度的公共財負擔問題，並透過內部的重整取得優勢地位，因而解決熵論題的必然衰退論。這又回到霸權論題，就是霸權穩定論的研究旨趣是理解，並支持世界經濟需要有霸權作為穩定者，關注霸權與世界秩序問題，擔憂霸權建立的世界秩序失序現象，進而再現霸權。

---

<sup>74</sup> Joseph S. Nye, "U.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Foreign Affairs*, 82:4 (Jul/Aug 2003), pp. 67-8;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4 (Winter 2002-3), pp. 552-5.

<sup>75</sup> 2003 年 11 月 9 日，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於倫敦白廳提到：世界的和平、安全與自由有賴於三個支柱：強有力的國際組織、自由國家在必要時使用武力捍衛自由的使命感、以及全世界實行民主。

<sup>76</s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2002, pp. 3-4.

### 三、全球化的契機：超越霸權

要超越霸權就必須理解結構(structure)與行動力(agency)，結構是象徵霸權的方式，行動力是象徵維繫或轉變霸權的能力累積。霸權是可吸收下層階級，以共同意識由上而下所形成的聯盟；反霸權則是由下而上，以相左於霸權的共同意識所形成的聯盟。超越霸權的戰略就是形塑反霸權以改變既有結構，然而這是十分困難的，因為霸權透過數種方式維繫本身的主導地位：主導世界經濟力量之間的協調，世界金融市場中的有效私人力量，以及降低活躍性市民社會的隱密世界(covert world)。<sup>77</sup>相對於再現霸權，反霸權的指導步驟如下：形成有利於反對主導力量的處境、喚起與刺激集體的意識、以及形成挑戰現有教條、主義與領導權的組織。<sup>78</sup>

時序進入廿一世紀，階級成爲全球化潮流中的代理人，目前全球化至少指涉四種現象：一、金融、貿易與資金跨國界流動的增加；二、上述現象伴隨著國家涉入與控制的衰退；三、多邊代理者與國際組織對世界社會經濟與政治事務的管理，亦即全球治理的強化；四、持續同質化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規則與慣例。但跨國歷史唯物論的角度而言，全球化必然是某些行爲者所推動，宣傳某些共同的意識形態，這是跨國企業與特殊少數的第三世界的布爾喬亞階級，複雜地而非簡單地利益聚合所成形的過程。<sup>79</sup>借助全球化之便，現階段的跨國歷史集團再度推廣由上而下的共同意識，將以往只限於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共識，推展到全球範圍，若不接受全球化現象，就等著被全球化潮流所淘汰。然而，自 1970 年代因霸權秩序所產生的危機，仍持續到今日，例如主要經濟強權間之爭執，第三世界對既存秩序的不滿等，這是超越霸權的轉機，尤其是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與全球生產模式所造成的不滿，更應加以利用而形成反霸權的意識形態。<sup>80</sup>另外，要以國界爲領域，積極的發展反霸權的公民社會。<sup>81</sup>徵收金融交易稅以援助公民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he Aid of Citizens, ATTAC)是一個反霸權組織，要求歐洲聯盟會員國徵收托賓稅(James Tobin Tax)，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sup>82</sup>

<sup>77</sup> Robert W. Cox, "The Way Ahead," pp. 55-6.

<sup>78</sup> *Ibid.*, p. 58.

<sup>79</sup> Alejandro Colas, "The Class Politics of Globalisation," 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 (e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97-8.

<sup>80</sup> 近來有不少書籍討論全球化與不平等現象的關聯性，例如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著，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台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02)；赫茲(Noreena Hertz)著，許玉雯譯，《當企業購併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台北：經濟新潮社，2003年)。

<sup>81</sup> 考克斯持續關注不同區域所可能產生的公民社會，如歐洲與美國，亞洲資本主義國家：日本與南韓等，國家崩潰與掠奪資本主義國家：蘇聯、中東歐、與部分拉美國家，非洲等，參見 Robert W. Cox and Michael G. Schecht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wer, Moral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06-14.

<sup>82</sup> ATTAC 於 1998 年成立於法國，繼承 1995 年法國大罷工之後的社會力量，主要訴求是對所有外匯交易徵收 0.1-0.5% 的稅金，抑制國際金融資本的快速流動，並將稅金用來幫助脫離貧困。參見網頁 <http://www.attac.org/indexen/index.html>。(2006 年 6 月 15 日閱讀)。音樂專輯《美麗新世界》(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就是替該組織募款的知名專輯。

綜合跨國歷史唯物論在霸權論題、熵論題與後霸權論題的論述，他們的目的是超越霸權，是三重超越霸權。第一重是超越論述的霸權，是以另外一種觀點切入霸權研究，國家中心論與社會力量、擔憂霸權衰退與關懷生產模式、再現霸權與超越霸權，三個論題都超越主流理論的霸權研究與範疇；第二重是超越主流霸權研究與背後的社會結構，主流研究以關懷特定行為者：國家，特定國家：英國與美國，以及特定的歷史時期，這背後都有其社會結構限制了關懷的視野，跨國歷史唯物論跳離這些框架；第三重是超越人類在結構中的困境，提供演化新的、有利於人類解放的途徑，從而賦予人們新的生命力，雖然在現實中仍有許多困難，但終究提供一扇窗、一道門。如此的關懷旨趣已經超越霸權。

## 陸、結論

三種研究旨趣：技術的、實踐的與解放的，指引研究的出發點與貫穿研究的中心思想。不同的研究旨趣，呈現不同的關懷，無論是對於透過技術佔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技術旨趣，維持相互理解的交互主觀性的實踐旨趣，或是將主體從依附於客體的力量中解放出來的解放旨趣。三者都擁有其存在的目的，沒有技術旨趣就難以尋找控制社會互動的規則，沒有實踐旨趣就難以理解互動背後的規則，沒有解放旨趣就難以超越結構對於人類解放的壓制。因此，旨趣不同但都有其目的性與價值性。再者，兩種理論的目的：問題解決的與批判的，提供判斷理論是維護現狀的或是超越現狀的，這也呈現兩種關懷旨趣，前者認為當前的結構是有助於本身的利益或所信仰的意識形態，後者認為人類具有超越現存結構的能動力，解放是最高目的。

循此，霸權穩定論與跨國歷史唯物論的研究旨趣就非常明瞭。本文在各段落結尾均有說明，此處不再贅言。透過兩者在霸權、熵與後霸權等三個論題的比較，希冀提供消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限制，當全球化被大力提倡的時候，不僅要關心全球化現象，也要關心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與背後的意識形態。結合從國家中心以及生產與社會力量的研究，不就能更透徹地認知、詮釋與批判全球化。放眼其他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連結不同理論視野與關懷，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質。否則，「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

另外，若是進行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比較，例如跨國歷史唯物論、歷史社會學派與世界體系論，將有可能得到更為寬廣的視野。例如史卡西波(Theodor Skocpol)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將國家視為面對內部與外部的壓力的轉化者；梯利(Charles Tilly)將國家視為國內體系暴力的合法壟斷者，以及戰爭與國家形成的關聯性。他們所關懷的是整體社會在長期歷史的變遷，這就與跨國歷史唯物論有所區隔。若我們針對特定議題，比較各理論流派的差異，更能理解行動者與結構的相互關係，進而跳脫結構的困境。

就本文取材的過程，發現跨國歷史唯物論的資料遠少於霸權穩定論，前者多

受到主流研究的忽略，較特殊的是奈伊與基歐漢多次給予重視；後者則掀起至今持續不墜的論爭，特別是美國政府對外行為的論爭，是帝國的行動，是霸權的行動，是國際合作的行動等。圍繞著美國霸權的論述佔據主流地位，顯示出學術研究領域中，也有另一種的霸權。

## 參考資料

### 中文資料

- 曾怡仁。2005。〈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之演進研究〉，《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第2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07-30。
- 古吉尼(Stefano Guzzini)著，鄭又平、黃烈修譯。2000。《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
- 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著，郭官義、李黎譯。2001。《哈柏瑪斯——認識與旨趣》。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 黃瑞琪。1996。《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
-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著，李明譯。2002。《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台北：大塊文化出版社。
- 赫茲(Noreena Hertz)著，許玉雯譯。2003。《當企業購併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台北：經濟新潮社。

### 英文資料

- Burchill, Scott, et al. 2001.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sup>nd</sup>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 Ltd.
- Cafruny, Alan W. 1990. "A Gramscian Concept of Declining Hegemony: Stages of U.S. Power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David P. Rapkin. (ed.) *World Leadership and Hegemon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0, pp. 97-118.
- Colas, Alejandro. 2002. "The Class Politics of Globalisation," 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 (e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91-209.
- Cox, Robert W. 1981.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2). Summer 1981, pp. 126-55.
- , 1983.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2(2). Summer 1983, pp. 162-75.
- , 1987.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The Way Ahead: Toward A New Ontology of World Order," in Richard Wyn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pp. 45-59.
- Cox, Robert W. and Michael G. Schechter.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wer, Moral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Germain, Randall D. and Michael Kenny. 1998. "Engaging Gramsci: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New Gramscia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1). Jan. 1998, pp. 3-21.
- Gilpin, Robert. 1975.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ttlieb, Roger S. 1993[1987]. *History and Subjectiv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t Theo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 Grunberg, Isabelle. 1990. "Exploring the "Myt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4). Autumn 1990, pp. 431-76.
- Guzzini, Stefano. 1998.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 New York: Routledge.
- Habermas, Jürgen, translated by Jeremy J. Shapiro. 1987.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Jones, Richard Wyn (ed.) 2001.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 Kennedy, Paul M.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2). Jun 1981, pp. 242-54.

- , 1986. "Hierarchy Versus Inerti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4). Autumn 1986, pp. 841-7.
- , 1988.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says on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Krasner, Stephen D. (e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83.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22.
- Linklater, Andrew. 1990.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 2001[1996]. "Rational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sup>nd</sup>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 Ltd., pp. 103-28.
- McKeown, Timothy J. 1983.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19<sup>th</sup> 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1). Winter 1983, pp. 73-91.
- Modelski, George. 1978.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2). Apr. 1978, pp. 214-35.
- , 1987.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urphy, Craig N. 1998. "Understanding IR: Understanding Gramsc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3). July 1998, pp. 417-25.
- , (ed) 2003. *Egalitarian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 Nye, Joseph S. 2002.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4 (2002-3), pp. 545-60.
- , 2003. "U.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Foreign Affairs*, 82(4). Jul/Aug 2003, pp. 60-73.
- Organski, A. F. K. 1968. *World Politics*, 2<sup>nd</sup> ed. New York: Knopf, Inc.
-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rganski, A. F. K., Jacek Kugler and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 Overbeek, Henk. 2000.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ies of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World Order," in Ronen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pp. 168-83.
- Palan, Ronen (ed.) 2000.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 Rapkin, David P. (ed.) 1990. *World Leadership and Hegemon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 Ruggie, John Gerard. 1975.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9(3). Summer 1975, pp. 557-83.
- Rupert, E. Mark. 1998. "(Re-)Engaging Gramsci: A Response to Germain and Kenn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3). July 1998, pp. 427-34.
- . 1995. *Producing Hegemony: The Politic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Class, 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USA," in Craig N. Murphy, (ed) *Egalitarian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03, pp. 7-35.
- Rupert, Mark and Hazel Smith, (eds.) 2002.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Russett, Bruce. 1985. "The Mysterious Case of Vanishing Hegemony; or, Is Mark Twain Really Dea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2). Spring 1985, pp. 207-31.
- Stein, Arthur A. 1984.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2). Spring 1984, pp. 355-86.
-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3. "U.S. Weakness and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Monthly Review*, 55(3). July 2003, pp. 23-9.
- Walter, Andrew. 1991. *World Power and World Money: The Role of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10